

流动时间与居住空间：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时空制约

——基于厦门市、长沙市与贵阳市的实证研究

罗竖元^{1,2}，李 浩³

(1. 贵州师范大学，贵州 贵阳 550001；2. 厦门大学 公共事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3. 湖南师范大学 社会学系，湖南 长沙 410081)

摘要：通过对厦门市、长沙市与贵阳市农民工随迁子女问卷调查资料的实证分析，我们得出的研究结论有：农民工随迁子女初次流动年龄对其城市融入呈倒“U”形影响；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居住时间越长，就越有机会习得“城市性”，并在群体间“接触效应”中“去污名化”，从而越有可能实现城市融入；大多数农民工随迁子女居住在“城中村”的这一城市居住分异的“客观事实”，导致其社会认同呈“内卷化”趋势，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代际传递的“贫困文化”对其城市融入起阻碍作用。

关键词：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流动时间；居住空间

中图分类号：D6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4533 (2013) 05—0020—05

我国的城镇化进程中，如何引导农民工及其随迁子女在所居住的城市实现社会融入的问题，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农民工随迁子女能否真正融入城市，实现身份与认同等方面由“农民”向市民的转换，是关系到我国新型城镇化战略推进速度和质量、关系到社会和谐稳定的重大现实问题。基于此，本研究试图从流动时间与居住空间角度探讨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时空制约，以为人们更好地认识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问题提供理论参考、同时也为建立一套切实可行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创新方案提供实证依据。

一、变量界定与数据来源

(一) 变量界定。

1. 自变量：流动时间与居住空间。时间是社会现象的内在因素，它是社会行动、社会生活和社会过程之形成的构成要素。^[1]而空间关系作为社会关系的物化，是以居住空间的分异为表征的。如列斐伏尔所言，“空间里弥漫着社会关系，它不仅被社会关系支持，也生产社会关系和被

收稿日期：2013—06—1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新生代农民工创业与城市适应问题的实证研究》(编号：12YJC840019)；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农民工返乡创业与就地市民化问题研究》(编号：13CSH034)；共青团中央2012—2013年度青少年和青少年工作研究课题《城市社区文化建设与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入问题研究》(编号：2013YB234)。

作者简介：罗竖元(1981—)，男，湖南新化人，贵州师范大学历史与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副教授，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社会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人口社会学；李浩(1984—)，男，湖南冷水江人，湖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社会学系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传播社会学。

社会关系所生产”^{[2]48}。基于此，本研究将从农民工随迁子女初次流动时的年龄与其城市居住时间两个方面来测量流动时间。而居住空间则以农民工随迁子女所居住的社区类型来反映，包括城中村社区、老城区居民区和新建商品房社区三种类型。具体操作与测量指标如下（表1）。

2. 因变量：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
城市融入从其本质上来说是一个逐步同化和不断减少社会排斥的过程，同时也是融入主体对城市未来的主观期望和城市居民的客观接纳相统一的过程。本研究认为，所谓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是指其在城市中获得与城市社会主流群体同等地摄取经济社会资源的机会，并不断消减其在社会交往、心理归属、经济状况与身份认同等方面与城市本地人之间的差异，实现社会主流群体的融入的过程及状态。在借鉴国内外有关探讨移民的城市融入的多维

表 1. 自变量的定义和描述性统计（N = 547）

自变量	具体指标	具体指标解释	均值	标准差
流动时间	初次流动年龄	农民工随迁子女初次流动时的年龄（年）	8.23	5.31
	居住的时间	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居住的时间（年）	2.42	1.15
居住空间	居住的社区 1	老城区居民区 = 1，其它 = 0	0.52	0.31
	居住的社区 2	新建商品房社区 = 1，其它 = 0	0.13	0.15
	居住的社区 3	城中村社区 = 1，其它 = 0	0.35	0.27

指标的基础上，我们设计了 13 个具体指标来测量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程度（见表 2），并运用主成分法对这 13 项指标进行了因子分析，采用方差极大化方法对因子负荷进行正交旋转，按照特征值大于 1 的标准进行因子抽取，共得到 4 个因子来代表这 13 个指标的主要特征。从表 3 可以看到，所有指标的共同度都达到 0.5 以上，4 个新因子累计方差贡献率达到其方差贡献率达到 59.429%，KMO 检验值为 0.703，Bartlett 检验的卡方值为 834.372，达到了相当高的显著性水平（Sig = 0.000），表明这些指标比较适合做因子分析。根据因子负载，将这四个因子分别命名为“社会融入因子”、“心理归属因子”、“经济适应因子”和“身份认同因子”。经检验得知，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量表的总体信度 Cronbach’s alpha 为 0.78。“社会融入因子”、“心理归属因子”、“经济适应因子”和“身份认同因子”的信度分别为 0.75、0.71、0.77 和 0.81。因此在信度上，各个因子均比较高。

表 2. 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因子分析结果

项目	社会融入因子	心理归属因子	经济适应因子	身份认同因子	共量
1. 你的生活开支与本地人的差距	0.201	0.135	0.721	0.117	0.592
2. 你的教育消费与本地人的差距	-0.114	0.251	0.684	-0.094	0.553
3. 你的住房条件与本地人的差距	0.247	0.116	0.646	0.154	0.515
4. 你与本地居民的交往情况	0.821	-0.116	0.126	0.132	0.721
5. 你对当地语言的掌握程度	0.741	-0.147	0.056	-0.114	0.587
6. 你的生活方式转变情况	0.684	0.079	-0.157	0.152	0.522
7. 你对本地风俗的熟悉情况	0.587	0.325	0.214	0.268	0.567
8. 你期望与本地人交往的意愿	0.218	0.827	0.178	0.121	0.778
9. 你对居住城市的喜爱程度	0.210	0.651	0.167	0.184	0.670
10. 你对居住城市的认同程度	0.247	0.621	0.214	0.132	0.510
11. 你对你目前身份认知状况	-0.269	-0.158	0.051	0.691	0.577
12. 你期待成为城市居民的意愿	0.135	0.247	0.179	0.682	0.576
13. 你期待返回家乡的意愿	-0.289	0.172	-0.261	0.614	0.558
特征值	2.477	1.990	1.702	1.557	7.726
方差贡献率	19.053%	15.307%	13.092%	11.977%	
累计方差贡献率	19.053%	34.360%	47.452%	59.429%	
Cronbach’s alpha (各维度)	0.75	0.71	0.77	0.81	
Cronbach’s alpha (量表整体)		0.78			

（二）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城市社区文化与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问题研究”课题的抽样问卷调查。此次调查抽样范围为厦门市、长沙市和贵阳市内 7—18 周岁的农民工随迁子女,调查实施的时间为 2012 年 7 月—12 月。抽样具体包括两个步骤:首先采用配额抽样方法,预定样本量为 600 个,每个城市分配样本 200 个。并且,为了提高样本的代表性和多样性,调查分别在学校和社区进行,在每个城市分别把 100 个样本分配给学校调查、另 100 个分配给社区调查;然后采取随机抽样法,在每个城市各随机抽取 2 所接受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学校与 2 个农民工聚居的社区;最后,从抽中的每所学校与每个社区中各随机抽取农民工随迁子女 50 名作为本次调查的调查样本。在调查过程中,对年龄较大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直接采取问卷调查的形式进行,但对年龄较小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则以问卷为访谈的提纲进行结构式访谈。此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600 份,收回有效问卷 547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 91.17%。

二、统计结果与分析

为深入探讨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时空制约,本研究以性别、年龄和迁移模式作为控制变量,以初次流动年龄、城市居住时间和居住社区类型作为自变量对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 5 个因子(社会融入因子、心理归属因子、经济适应因子、身份认同因子和总体城市融入)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其中“总体城市融入”是以各因子的方差贡献率为权数而计算城市融入的综合得分的,即社会融入因子值 $\times 0.19053$ + 心理归属因子值 $\times 0.15307$ + 经济适应因子值 $\times 0.13092$ + 身份认同因子值 $\times 0.11977$ 。同时,为了更直观地展示各个因子在城市融入的各个维度上的融入状况、以及在回归分析中更清楚地分析各个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程度,本文运用公式把这五个因子转换为 1—100 之间的指数。^①回归分析结果如表 3 所示。

在进行回归分析之前,本文对模型可能存在的多重共线性、异方差和序列相关问题进行了检验。两模型中各变量的 VIF 值(方差膨胀因子)均大于 1 且小于 2,说明两模型不存在多重共线性问题;DW 值为 1.834、1.793,说明两模型不存在序列相关问题;分别对回归模型以标准化预测值为横轴、标准化残差为纵轴进行残差项的散点图分析,散点图呈无序状态,说明两模型不存在异方差问题。而从回归分析结果中的修正后判定系数 Adjusted R^2 可以看到,自变量对总体城市融入程度的解释力达到了显著水平($R^2 = 0.266$, $P < 0.001$)。从具体因子来看,对社会融入的解释力最大($R^2 = 0.302$, $P < 0.01$),对身份认同的解释力最小($R^2 = 0.105$, $P < 0.001$),对心理归属和经济适应的解释力分别为 0.217 ($P < 0.01$) 和 0.152 ($P < 0.01$)。

从各自变量的影响作用来看,居住时间对总体城市融入程度的回归系数为 5.194 ($P < 0.001$),说明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的居住时间每增加 1 年,其总体性城市融入程度将提高 5.194 分。从具体的城市融入因子来看,居住时间对社会融入、心理归属和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其回归系数分别为 4.321 ($P < 0.001$)、4.098 ($P < 0.01$)、和 -1.502 ($P < 0.01$)。换言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的居住时间每增加 1 年,其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和身份认同程度将分别增加 4.321 分、4.098 分和减少 1.502 分。但也有学者的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居住时间对社会融合的影响不完全是线性的,不同的居住时间段对社会融合的影响是不同的,只有居住时间在 10 年及以上,才对社会融合有显著正影响。^[3]这是因为在一个地方待的时间越长,移民想改变居住地的愿望就会越低,因为改变居住地的负担和风险就会越高。^[4]

而从农民工随迁子女初次流动的年龄来看,农民工随迁子女初次流动年龄及初次流动年龄的平方对社会融入、心理归属、身份认同和总体城市融入有着显著的影响,但其回归系数表明,农民工随迁子女初次流动年龄对城市融入的影响可能性呈倒 U 形关系。即随着初次流动年龄的增加,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程度有所提高,但达到一定高度后又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这与以往相关研究结论是一致的。年龄和本地身份的认同之间呈现倒 U 型曲线关系,年龄较大的

群体和年龄较小的群体，较之中年群体，对本地身份的认同程度都较低。^[5]但也有学者发现年龄与城市融入呈线性相关，年龄越大的农民工更容易建立和城市居民的联系。^[6]

从居住的社区类型来看，城中村社区对总体城市融入程度的回归系数 - 5. 845 ($P < 0. 001$)，说明在控制其他自变量的情况下，居住在城中村社区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比居住在老城区居民区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的总体城市融入程度低 5. 845 分。从具体的城市融入因子来看，城中村社区对农民工随迁子女的社会融入、心理归属、身份认同和经济适应有显著影响，其回归系数分别为 - 5. 252 ($P < 0. 01$)、 - 4. 631 ($P < 0. 001$)、

- 2. 238 ($P < 0. 01$) 和 2. 235 ($P < 0. 01$)。换言之，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与居住在老城居民区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相比，居住在城中村社区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在社会融入、心理归属、经济适应和身份认同程度等方面将分别降低 5. 252 分、4. 631 分、1. 502 分和增加 2. 235 分。已有研究也表明，传统农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交往以地缘、血缘等乡土社会关系为纽带，依附于特定的社会空间^[7]，典型研究如北京的浙江村、河南村等，展现了外来人口通过“地缘”为基础的社会网络塑造“非国家空间”(Non-state space) 的过程，“城中村”的出现在一定程度上标明了农民工城市社会融入度低。^[8]

三、结论与讨论

通过对厦门市、长沙市与贵阳市 547 名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实证调查，我们可得出如下结论。

(一) 农民工随迁子女初次流动年龄对其城市融入呈倒“U”形影响。

年龄较小的农民工随迁子女对乡土社会“嵌入”不深，容易“脱嵌”出来并在城市“重新嵌入”；随着初次流动年龄的增加，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融入程度有所提高，但达到一定高度后又随年龄的增加而下降。这是因为，城市性与现代性的动力实际上源于吉登斯所言的“脱域”机制，即“社会关系从彼此互动的地域性关联中‘脱离出来’”，是把社会关系从地方性的场景中“挖出来”，然后再使社会关系在无限的时空地带中进行“再联结”或“再重组”。^{[9]42}在这一过程中，作为城市融入实践主体的农民工随迁子女，是嵌入于城乡的社会结构、认知、文化和政治之中的，与初次流动年龄较大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相比，年龄较小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由于其对乡土社会的“嵌入”不太深，容易从“乡土社会”的地域性关联中“脱嵌”出来，并在城市这一现代性“场域”中“再联结”与“重新嵌入”。此外，从城市融入的主观体验来看，在现有的城

表 3. 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的回归分析（非标准化系数 Beta 值）

自变量	模型 1 社会融入因子	模型 2 心理归属因子	模型 3 经济适应因子	模型 4 身份认同因子	模型 5 总体城市融入因子
性别 a	2. 126	1. 530	- 1. 331	0. 972	2. 151
年龄	3. 217 **	- 2. 013	- 1. 785	- 2. 114 **	- 2. 817 **
流动的模式 b					
父子迁移	2. 024	- . 941 ***	1. 008	1. 324	3. 210
举家迁移	3. 326 **	3. 447 **	3. 639 ***	2. 364	4. 263 **
居住时间	4. 321 ***	4. 098 **	- 1. 136	- 1. 502 *	5. 194 ***
初次流动年龄	3. 234 **	2. 105 **	1. 812	1. 006	2. 124 **
初次流动年龄的平方	- . 897 ***	- . 621 **	- . 534	- . 487 ***	- . 774 ***
社区类型 c					
新建商品房社区	- 1. 536	- . 991	1. 593	1. 374	1. 551
城中村社区	- 5. 252 **	- 4. 631 ***	2. 235 **	- 2. 238 **	- 5. 845 ***
N	547	547	547	547	547
Constant	11. 310 **	9. 598 **	8. 586 **	- 3. 631 ***	9. 637 ***
Adjusted R2	. 302	. 217	. 152	. 105	. 266

注释：①参照类：a 参考变量为“女性”；b 参考变量为“老城居民区”；c 参考变量为“母子迁移模式”；d 参考变量为“城市基层政府”；②* $P \leq 0. 05$ ，** $P \leq 0. 01$ ，*** $P \leq 0. 001$ **** $P \leq 0. 0005$ 。

乡分割语境下,农民工随迁子女融入过程中都有可能遇到各种“社会隔离与排斥”机制及城市居民“污名化”等评价图式,初次流动年龄较大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一般都会对这些消极信息较为敏感、从而阻碍其城市融入的步伐。而初次流动年龄较小的农民工随迁子女由于“年龄小”而对城乡隔离的“社会屏蔽”机制以及城市居民“污名化”的“评价图式”等负面信息不太敏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其城市融入的阻碍作用。

(二) 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居住时间越长,就越有机会习得“城市性”,并在发挥群体间的“接触效应”的过程中起到“去污名化”效应,从而越有可能促使其实现城市融入。

农民工随迁子女城市融入实质上是对社会交往、心理归属、经济行为与身份构建方面进行再社会化、逐渐减少与城市人之间的差异的过程,而居住时间是影响其“再社会化”进程与效果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农民工随迁子女的城市居住时间越长,越可以增加与社区居民的交往机会,让其在共同的社区活动中加深相互理解、消除误会。不同群体成员之间频繁的社会互动有利于成员之间产生正面的感情联系,最终形成宽容精神。宽容精神的形成不仅能理顺社区内各种人际关系、协调社会矛盾,更重要的在于它能促进代表“乡土文化”的农民工随迁子女与代表“都市文化”的城市居民之间的互动与包容,这最终有助于社区个体成员之间形成和谐的人际关系,避免文化矛盾和冲突。

(三) 大多数农民工随迁子女居住在“城中村”这一城市居住分异的客观事实,导致其社会认同呈内卷化趋势,基于此而形成的能够代际传递的“贫困文化”对其城市融入起阻碍作用。

居住分异(Residential Differentiation)是指具有特定特征和文化的人群在城市中居住在一起从而形成特色邻里的倾向。^[10] 农民工随迁子女大都居住于“城中村”社区的“客观事实”既是城乡隔离的二元社会体制的“社会屏蔽”机制的结果,同时也是农民工随迁子女“社会性防御”(social defense)策略的结果。一方面,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化进程中与城市本地居民虽然“共居”于同一城市空间,但他们之间的交往却是隔离的,客观上生活在“两个世界”,农民工随迁子女大都生活在环境条件恶劣的“城中村”,空间的隔离造成他们与城市居民之间存在着情感上的隔离,这两大人群在许多方面是格格不入、彼此缺乏信任的。另一方面,农民工随迁子女在城市重建以血缘、地缘关系为主要联系纽带的“乡土社会”空间,导致其社会认同呈“内卷化”趋势,当然这种“社会性防御”策略并不是一种基于本能和非理性的社会行为选择,事实上,这种对乡土社会关系的复制和扩大是其城市融入失败的产物,是一种遭到城市“社会性排斥”而做出的无奈选择,是一种城市生存策略。而这种局面会导致贫困文化的代际传递。正如刘易斯所指出的“棚户区的孩子,到6—7岁时,通常已经吸收贫困亚文化的基本态度和价值观念。因此,他们在心理上不准备接受那些可能改变他们生活的种种变迁的条件或改善的机会。”^[11] 班费尔德也用“非道德性家庭主义”来解释“穷人基本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去利用机会摆脱贫困之命运,因为他们早已内化了那些与大社会格格不入的一整套价值观念”^[12]¹⁵⁶。而城市融入需要“具有自觉的主体性和自我意识的个体的生成,需要一种以平等的交互主体性为基础的理性的公共活动空间,来表达主体性的内涵和价值需求,或者抵御公共权力的自律化所造成的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13] 而与城里人互动的社区正好提供了这种融入城市的“公共活动空间”,这最终有助于逐渐改变其在社区话语体系中的边缘位置,有助于其融入城市社会。

注释:

① 转换公式是: 转换后的因子值 = (因子值 + B) · A。其中, $A = 99 / (\text{因子最大值} - \text{因子最小值})$, $B = (1/A) - \text{因子最小值}$ 。B的公式亦为, $B = [(\text{因子最大值} - \text{因子最小值}) / 99] - \text{因子最小值}$ (参见边燕杰、李煜, 2000)。

参考文献:

[1] 景天魁. 中国社会发展的时空结构 [J]. 社会学研究, 1999, (6).

[2] 列斐伏尔. 空间: 社会产物与使用价值 [A]. 包亚明主编. 现代性与空间生产 [C].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下转第31页)

入增量中,要优先考虑欠发达地区,使新增加的资源大部分投入欠发达地区,以增量资源带动和引导存量资源,最大限度地减少科技投入的“路径依赖”;再次,地方政府要在加大财政支出的前提下,调整支出结构,尽可能将财政资金投入到科技和教育事业上,为经济的长远发展夯实基础。

3. 制定合宜的“十二五”科技发展规划。各地“十二五”科技规划蓝图的实现离不开合理的规划和切实可行的措施,各级地方政府应更多地考虑本地的实际情况,结合产业结构、发展方向及财政能力,做出切实可行的合理定位。过高的 R&D 经费强度,不仅缺乏对各地的财政能力的考虑,即使达到了,在我国现有体制下,也必然会导致地方政府以“运动式”的方式增加科技投入,导致资金的使用效率与产出不高,最终不利于科技的发展。

注释:

①由于西藏规划没有具体指明 R&D 经费支出目标值,因此无法比较;海南由于 R&D 经费支出少于财政科技投入,因此,本研究也不包括在内。

参考文献:

- [1] 岳洪江,梁立明. 90 年代我国三大地带科技指标差距变动分析 [J]. 科学学研究,2000,(4).
- [2] 地方科技发展战略研究课题组. 加强地方县(市)科技工作的对策措施 [J]. 中国科技论坛,2005,(5).
- [3] 魏守华,吴贵生. 我国省区科技空间分布特征、成因及其政策含义 [J]. 管理世界,2005,(4).
- [4] 杨鹏. 我国区域科技发展差异研究 [J]. 科学管理研究,2007,(3).
- [5] 江依妮. 中国政府公共服务职能的地方化及其后果 [J]. 经济学家,2011,(7).
- [6] 张永军,梁东黎. 晋升激励、官员注意力配置与公共品供给 [J]. 理论导刊,2010,(12).
- [7] 陈林,陈德山. 第三条道路——世纪之交的西方政治变革 [M]. 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2000.
- [8] [美] 迈克尔·波特. 国家竞争优势 [M]. 华夏出版社,2002.
- [9] 伍文中. 新疆财政科技投入的反思与对策——基于跨越式发展视角 [J]. 技术经济与管理研究,2011,(5).

责任编辑:王升平

(上接第 24 页)

- [3] 陆淑珍. 居住时间与新生代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合研究 [J]. 调研世界,2011,(7).
- [4] 朱宇. 新生代农民工特征、问题与对策 [J]. 人口研究,2010,(2).
- [5] 崔岩. 流动人口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和身份认同问题研究 [J]. 社会科学研究,2012,(5).
- [6] 段学芬. 农民工的城市生活资本与农民工的市民化 [J]. 大连理工大学学报,2007,(3).
- [7] 李培林. 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 [J]. 社会科学研究,1996,(4).
- [8] 柯兰君,李汉林. 都市里的村民: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 [M]. 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 [9] [英] 安东尼·吉登斯. 现代性的后果 [M]. 南京:译林出版社,2000.
- [10] Immons, J. W.. Changing Residence in The City——A Review of Intraurban Mobility [J]. Geographical Review, 1968,(4).
- [11] Lewis, O. The Culture of Poverty [J]. Scientific American, 1966,(4).
- [12] Banfield, E. C.. The Moral Basis of a Backward Society [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1958.
- [13] 衣俊卿. 现代性的维度及其当代命运 [J]. 中国社会科学,2004,(4).

责任编辑:王升平